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与社会

——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叙述

尹建东 吕响得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关键词: 秦汉时期; 洱海区域; 族群; 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7)01-0041-08

一、引论: 洱海区域的历史空间与族群地理

关于洱海区域的地理空间范围,在学术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主张广义概念的学者如童恩正认为,“洱海地区以洱海为中心,包括滇西北的澜沧江、金沙江流域在内”^{[1](P35-55)},即大理、丽江、中甸、迪庆全境以及楚雄北部地区。这种观点主要着眼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分区与文化类型,因而其所涵盖地理空间范围相对较大。不过大多数研究者通常取其狭义,认为历史上的洱海区域主要是泛指洱海沿岸及其周围地区,包括今大理市和洱源、剑川、鹤庆、巍山、祥云、弥渡、宾川、漾濞、永平、云龙等县,也就是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行政区域的大致范围。本文在讨论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历史与社会变迁时,主要基于大多数学者对洱海区域地理空间的界定,同时从区域史多维研究视角出发,将秦汉时期的洱海区域视为一个自成一体、又与周边地区频繁发生联系的特定历史空间。

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洱海区域

既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地理空间,又是一个由不同时期的人群活动而形成的文化空间。该区域地处云贵高原的西段,横断山脉的中部及南部,西北部高山峡谷纵横,东部相对平缓,山间盆地(西南俗称“坝子”)错落其间,洱海坝子、祥云坝子、鹤庆坝子、巍山坝子等即为境内较大的“坝子”。由于地势复杂多样,垂直差异明显,因此气温和降水随着海拔高度的不同差异很大,形成了河谷热,坝区暖,山区凉,高山寒,“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特征。这种地理环境造就了区域内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种类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而为早期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已经发现了数量很多的动物骨骼、植物果核,以及河湖旁边为数众多的贝丘遗址。洱海区域史前文化比较集中的几个区域,如海东银梭岛、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等都是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性较为典型的地区。研究者通过对洱海及周边地区实地考察,并结合洱海特定地质、气候环境下的发展状况,指出历史上洱海地区

收稿日期: 2016-12-10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唐时期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互动整合研究”(16BZS100)

作者简介: 尹建东(1965-),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响得(1990-),男,甘肃定西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史研究生。

人群或族群活动的主要趋势是从高处往低处发展。这一结论也符合环境考古学研究得出的人类活动的基本生存模式：山——山原——较高台原——低台原，其中的原因与人类社会的进化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环境变迁、地貌类型以及气候变化等社会自然因素有关。^{[2](P63-68)}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地貌及气候条件是决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生存资源最主要的环境因素，也是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面临的最主要的环境”。^{[3](P284)}

需要指出的是，西南地区与平原地貌为主的中原地区不同，复杂的山地地貌为在此生长居住的族群划定了若干彼此隔离但垂直差异显著的有限空间。在同一地理单元内的不同地带分布着多种族群，他们很早就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洱海区域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即使是地方特点较浓厚，完全根植于当地自然环境和民族氛围中的一种区域性文化也不可能永远在一个相对封闭、狭窄的地带，既拒绝与任何外界接触，也不接纳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4](P108)}而且由于生态地理环境造成的生计方式上的差异性和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使得族群之间的互动交流有了现实的需求和可能，造成了洱海区域在历史时期能够形成多族群聚居交流碰撞的复杂局面。正如考古学家张增祺所看到的：洱海区域“因其境内山川多呈南北走向，河谷两岸又有许多较平坦的阶地。因此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草原及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由北向南迁徙或与西南地区原住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这一地区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虽多为南北走向，但有的呈崎岖起伏状，期间有许多小型的高山盆地（‘坝子’），也有不少便于人们通行的‘垭口’（‘驼峰地带’）上述横向的低洼地段，又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通道。”^{[4](P18)}由此可见，洱海区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等原因，不仅成为历史时期多族群迁徙活动频繁发生、多元族群相互交流碰撞的天然“民族通道”或“民族走廊”，而且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洱海区域有着深厚的史前文化积淀基础，一直是“前南诏”时期中国、印度等多种文明体系之间交流互动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5](P242)}

关于洱海区域早期历史，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族群间交流互动的历史线索尚不十分清晰。但是从考古发掘和后世零星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洱海区域很早就成为了由不同族群繁衍、生

息构成的地区性多元族群发展的历史舞台，其中农耕人群应是区域内最早的居民，也是洱海青铜文化的主要创造者；第二，秦汉以前洱海区域周边的其他族群特别是游牧人群相继进入该区域，极大地改变了洱海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和经济文化面貌，增添了区域族群多样化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时期的洱海区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时空单元，而是和周边地区存在着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空间。洱海区域所具有的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也就决定了多维度历史叙事的基调，特别是把各类不同生态—区域的视角纳入到洱海区域史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分析洱海区域多元结构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探讨区域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对洱海区域族群和社会新的理解与认识。

二、洱海区域的族群流动及其文化变迁特点

历史文献涉及两汉洱海区域的族群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洱海区域从无文字记载的时代进入有文字记载时代的开始，与此同时，被称为“昆明”“斯榆”“嵩”的地域性族群也以非华夏的“他者”形象进入到中央王朝的视野当中。之后，《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均延续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撰述体例，对包括洱海区域在内的“西南夷”族群的活动情况进行了简要的记述。然而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华夏与非华夏人群的疏离，加之撰述者本身的文化偏见，能够在文献中留下历史印记的只是少数族群，而且相关记载不仅对其族称、族源、文化习俗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对其具体地理空间和方位的描述也非常模糊，这些不连贯的，甚至是“碎片化”的历史叙述，一直主导和影响历代研究者对洱海区域族群历史的认识。尽管不少学者将文献记载中族群演变的线索与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识别比较，试图找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实际上，由于族群流动及其空间转换的多变性，导致了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要想对秦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的历史进行重构，除了传统的文献与考古“二重证据法”之外，可能还需要借助文化生态学、民族地理学、人类学等多重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在下文中笔者拟从“昆明”“斯榆”两个个案研究入手，对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流动与文化变迁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昆明”。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昆明”是当时洱海区域影响力较大且分布较广的一个族群，“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斯榆，

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6] (卷116, P2991)}另外，书中还记述了昆明人在汉武帝时期阻碍中原王朝使者开通“蜀身毒道”等若干历史事件。关于“昆明”分布的具体空间范围，方国瑜经过考证认为：“同师在嵩唐地区，斯榆在昆明地区。”^{[7] (P15)}而“嵩唐”在今保山一带，^{[7] (P20)}“昆明”在今大理地区。^{[7] (P14)}因此，“嵩”“昆明”的大致位置应在今保山至大理一线区域，而“昆明”的主要活动范围及其比较稳定的分布区应该是在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由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相关文献在对两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历史的记载中较多以昆明人为主，而古代历史文献多以部族名指称地方，又以地名指称部族，地名与部族名多有互相对调使用的习惯，因此，两汉时期的洱海区域因昆明人的大量出现而泛称“昆明”，又将两汉时期洱海区域各族群视为一整体而统称为“昆明”。由此可知，对“昆明”的概念应该有两种理解，一为地名，泛指洱海区域及其周边地区；一为族群名，狭义上指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昆明族群，广义上又可将洱海区域各族群视为一整体而统称为“昆明”。在对两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厘清“昆明”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各种实际含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规避因文献记载的模糊和笼统而造成的对史实的误解与误判。

在文献记载中，汉代洱海区域的昆明人“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应该是典型的游牧人群。但是，该区域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2世纪）与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1世纪初）的文化遗存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文化类型，却与文献相关记载有较大出入。考古资料显示，洱海区域的经济自新石器晚期以来一直以农耕、渔猎、采集为主。例如宾川白羊村、永平新光等遗址均发现分布较为集中的房屋、窖穴、灰坑、火塘等建筑遗迹，文化堆积层较厚，说明它们大都是经过较长时期居住的村落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铤、石镰、石刀、石磨棒，以及一定数量的石矛、石镞、石凿、网坠和陶器、骨、角、蚌器等。另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经鉴定属于人工栽培的粳稻。这些均反映出当时人们生计方式的多样化特点，而农业则是其经济主体。

进入青铜时代之后，洱海区域的文化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源于西北氏羌系族群的昆明人长期不断地进入洱海区

域，从而导致了区域文化形态的变迁。有关昆明人的迁徙问题，前辈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如张增祺对滇西考古文化遗存分布的考察后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昆明人主要分布在怒江、澜沧江河谷地带，大约从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前6世纪前后，昆明已陆续从澜沧江河谷沿其支流漾濞江进入洱海区域北部的剑川、鹤庆一带。^{[4] (P134)}当昆明人进入上述地区后，即以他们原有的有肩石斧的器形，铸出滇西地区最早的有肩铜斧。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址，正好反映了两个时代和两种文化的交替过程。到后来，整个洱海区域及滇西地区的青铜斧全部变成“昆明式”的有肩斧，说明当时“昆明”已成为滇西地区的主要民族。约在春秋末或战国初昆明人又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继续向东扩展。他们经过今大理弥渡、祥云、楚雄姚安等地，首先和当地的“大石墓”文化相接触。姚安黄牛山“大石墓”葬之上叠压一批竖穴土坑墓，墓中有和“昆明式”相似的青铜器等考古资料说明，当昆明人大规模向东扩张时，原居于该地的“大石墓”民族被迫向他地迁徙或部分融于昆明人中。^{[8] (P298-315)}

昆明人“随畜迁徙，毋常处”的生计方式，基本上属于游牧经济形态。这种生计方式存在的时间很久，直到唐代人们对洱海区域族群生计方式仍有记载，并较为详细的描述了这种游牧经济的主要特点。《新唐书》载：“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土歌湿，宜粳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9] (卷222, P6318)}可见，两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昆明人，并没有因为族群大迁徙而在洱海区域消失殆尽，一直到唐代仍有他们生活的踪迹。由于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不同自然环境的限制，昆明人不能够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大范围迁移，于是，他们根据洱海地区河谷的气候和植物垂直分布的地理特点，选择了一种“夏处高山，冬入深谷”，以“垂直游牧”为特征的游牧经济形态，即每逢夏、秋季间将畜群赶往气候凉爽的山区放牧，春、冬季间又回到气候温和的河谷地带。直至近代，横断山脉河谷地带的少数民族仍保持着这种生态适应性游牧经济。

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关于西汉洱海区域的族群记载，存在模糊性和笼统性，尤其是以“昆明人”指代洱海区域整体族群，导致对洱海区域族群的认识过于单一，缺乏对其族群流动性及文化变迁过程多

元性的深入了解。从洱海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来看,在西汉以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该区域农耕族群的文化特征在整体上还较为明显,到西汉以后才基本上为游牧文化所覆盖。从经济类型来看,西汉以前,农业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畜牧业只居于次要的补充地位,之后,随着游牧人群数量的不断增多,洱海区域的畜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农业则居于次要地位。而司马迁所见到的只是以游牧为主的昆明人群的活动情况,因此形成了两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历史发展以游牧民族昆明人为主的传统观点。近年来,李昆声、钱成润等学者通过对先秦时期洱海区域族群历史的梳理,提出了“昆明国”的概念,并对“昆明国”的地域范围及考古文化遗存进行了阐释和考证。^{[10] (P307-312)}从理论上来说,能否用“昆明国”概念描述洱海区域早期族群历史发展面貌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作者提出“昆明国”所在区域长期存在着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半农耕半游牧民族等多种文化类型,应该是有充分依据的,相关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洱海区域早期历史阶段族群发展就已经存在的多元化特征,突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洱海区域早期族群历史发展单一化的传统认识。

(二)“斯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相关文献对两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历史记载除了以游牧为主的昆明人以外,还涉及到另一族群——斯(叶)榆人,关于斯榆人的记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6] (卷117, P3047)}又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书》说:“于是乃命使西征……因朝冉从駹,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满。”^{[6] (卷117, P3049)}方国瑜对此认为,“疑斯榆就是牂榆,牂即葉。……司马相如所远略的斯榆就是葉榆。”^{[11] (P199)}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嵩唐,侯王国以什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12] (卷4, P333)}方国瑜认为,《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这段记载,专门提出叶榆而没有昆明地名,以叶榆来代替昆明,正反映了叶榆是昆明部落中最大的族群。^{[11] (P199-200)}从上文对“昆明”概念的释义可知,昆明作为族群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昆明与叶榆同为两汉时期洱海区域重要族群,广义上,昆明又是涵盖了叶榆在内的两汉时期洱海区域各族群总称。方国瑜注意到史籍中对叶榆人的记载,并认为叶榆人是昆明部落的重要族群,识见可谓卓越,但较为遗憾的是,因为对“昆明”一词理解上的偏差,方国瑜似乎混淆了

叶榆与昆明之间既区分又统一的关系,只是简单的将叶榆看作是昆明部落之下的一个族群,即看到了广义上叶榆统一在昆明之下的关系,而忽略了狭义上叶榆与昆明彼此作为独立族群相互区分的情况,也没有进一步从文化生态与生计方式等方面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如上文所述,早在昆明人进入洱海区域之前,当地土著居民就已经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生计方式。在洱海区域的核心地带,如海东银梭岛、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等,都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植被茂盛,居住在坝区和湖旁台地的土著人群,充分利用洱海、剑湖等高原湖泊为主的生态系统,在对环境的适应中形成了农耕、渔猎、家畜饲养等不同的生计方式。可见环境对于早期人类活动有着重要意义,人类一切行为表现包括生计类型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同时环境对早期人类的“族性”(ethnicity)和“认同”(identity)的形成也有重要意义。诚如沈海梅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史前时代的很长时期捕鱼和稻作农耕是洱海区域最主要的生计类型,形成‘土著洱海人’整体中不同人群分类的基础。生计差异是洱海区域史前时期有意义的族群身份标志,生计差异产生族际意义的地方在于,不同的生计下会形成不同的寻食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使用的工具不同,所获取的食物不同,对环境的利用和依赖不同,对作物和牲畜的驯化不同,结成的社会关系不同,构成了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核心内容。”^{[5] (P229)}进一步讲,不论是早期土著洱海人,还是外来的昆明人,其族性及文化表征都是在有差异的生计和文化特质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生活在同一地理空间但不同时代的“土著洱海人”与“斯榆”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张增祺等学者认为二者在文化类型上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指出:“斯榆是洱海区域的古老民族,至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即已定居在洱海沿岸及其以南地区,从事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直至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亦无太大的变化。”^{[4] (P116)}笔者同意张增祺关于斯榆人为“土著洱海人”的认识,但是对斯榆人在与其他族群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还能够一直稳定地维持固有的生计方式存有疑问。结合沈海梅对洱海区域史前文化的研究,笔者更倾向认为,以斯榆人为代表的汉代“土著洱海人”应该仍以渔猎捕捞和

稻作农耕的生计类型为主,但是也不排除其中一部分从事畜牧业的当地土著人群,会随着昆明人的大量进入而逐渐被同化和融合的可能。另外,其他学者关于古代洱海区域土著族群的相关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林超民认为:“从目前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明显反映的,我们只能认定洱海地区新石器与青铜器的创造者是文献失载的‘古代洱海人’,是洱海地区土著的定居农耕族类。‘洱海人’是洱海地区最早的居民,就是白族最早的源头。他们很可能就是唐代洱海区域的‘西洱河蛮’的先民。”^{[13] (P291)}虽然文献记载并没有明确斯榆人的生计类型及文化特征,但结合上文对斯榆人地域、文化、生计类型的分析,可以判定,两汉时期洱海区域的土著族群中,斯榆人应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系统地继承了“土著洱海人”的农耕文化因素之外,又在某些方面吸收了周边其他族群特别是游牧人群的文化因子,因此其生计方式较为多元化——部分从事稻作农耕经济,部分从事渔猎捕捞,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由于地域环境的原因混杂在以游牧为主的昆明人之中,从而使所在区域带有了游牧族群特有的文化面貌。

实际上,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秦汉时期的洱海区域,除了“昆明”“斯榆”等较大规模的族群外,也有来自于滇西北的“僇”、滇西的“哀牢”、川南的“濮人”,以及滇东的“爨人”等不同类型的族群,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区域。由于洱海区域地广人稀,因此人们可以在山地丘陵、河谷地带、湖旁台地和平坦的坝区,找到适合他们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并根据当地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迁移。这些族群虽然由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相互间的交往、交换较为频繁,甚至因资源竞争而发生冲突,但彼此之间由于经济文化交流而完全融合的情形却相对较少。在《华阳国志》中说古代洱海区域有“上方夷”“下方夷”的人群划分,在考古发掘中,也“极少发现斯榆文化渗透或叠压在别的民族文化分布区或其他地层之上的情况。说明当时洱海区域各民族均有其较固定的文化分布区域和生活空间”。^{[4] (P130)}这些都反映出地理环境对族群的生计及其文化的其他方面所带来的莫大影响,使得不同人群在交往和流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以及西南地区特有的“大分散,小聚合”的空间分布格局。

三、王朝力量的介入与洱海区域族群关系的变动

秦汉时期,由于洱海区域与内地相距遥远,加之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所以较少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在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之前,该区域内部既没有能够与中央王朝高度整合的地方行政体制,也不存在像滇、夜郎、哀牢这类人口较多的类似于“华夏式”政治体的酋邦。不论是“昆明”“斯榆”,还是其他外来或土著人群,其政治组织发育程度普遍较低,社会组织既不相统属又相对分散,加之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环境、与华夏差异甚大的文化形态,因而长期游离于王朝统治边缘之外,在文献中也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14] (P51-60)}

自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以来,为强化对西南疆域的控治,三十余年间先后设立了益州、牂牁、犍为、越巂、汶山、武都、沈黎等七个“初郡”,但是在洱海区域却并没有单独设郡,比如境内所设之云南县,西汉时隶属益州,东汉时隶属永昌,实际上无法直接控辖洱海区域。对于这种局面的成因,方国瑜认为:“洱海区域的昆明族,居住在两汉时期所设叶榆、邪龙、云南、弄栋、青蛉、姑复、遂久等七县境内,散为部族,没有发展到部族联结阶段,也就是说没有统一的机构。”^{[15] (P221)}这说明洱海区域人群的“非华夏”政治组织形态对汉王朝疆域扩张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和影响。然而从较长时段来看,真正阻止汉帝国深入洱海区域的,主要还是地理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生态的差异和文化差异。这正如胡鸿在《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一文中所指出的,“在农业条件和交通状况都不理想的西南夷地区,汉朝虽设了郡县,但这些初郡无法收税,一切行政费用和吏卒都靠邻郡供给。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维持当地原有的政治组织,王、候、邑长等土官系统得以保持,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羁縻式管理”。在这种情形下,“最适合被整合的,莫过于一个较小型的华夏式政治体。相似的官僚制度、郡县制度甚至统治手段,都让它能够迅速地被吸收进汉帝国,最不适合被吸收的,则是分散的、阶序化不发达的政治体,甚至尚无稳定政治体的松散人群,这样的人群配合上深险的地理环境、非农耕非定居的生活形态,能够有效游离于帝国控制之外。”^{[16] (P184-203)}

由于对洱海区域难以进行有效的开发治理,所以汉帝国对其采取的统治策略与以“羁縻”为主的滇、夜郎等地明显不同,基本上是停留在军事征服的层面上。当时“昆明”一直是这一地区势力较大、

人数较多的族群,因而和汉王朝发生的冲突和战争经常见诸史籍。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其北方闭氏、笮,南方闭嵩、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6] (卷123, P3166)}同书亦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嵩、牂牁、沈黎、汶山郡……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6] (卷123, P3170)}由于周边的郡县无力控制洱海区域的局势,因此多由朝廷征调其他地方的军队前往镇压。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昆明”族群势力的强大难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洱海区域成为了汉王朝西南边疆扩张难以推进之处——即其生态、地理的极限所在。

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年—前81年)益州、牂牁等地爆发了地方土著族群与汉王朝之间数次大规模的武力对抗。据《汉书·昭帝纪》记载:“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牂牁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四年)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五年)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17] (卷7, P218-223)}此次战事亦载《汉书·西南夷传》:“后二十三岁(按:元封二年后),孝昭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凡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17] (卷92, P3843)}据《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有二十四县,其中叶榆、邪龙、云南、弄栋、比苏、不韦、嵩唐、来唯八县分布在洱海和永昌地区。这当中廉头即弄栋,姑缯即青蛉,叶榆即斯榆,均在洱海区域。文献所透露出的信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战争规模大,波及面广,被征讨的对象主要是游牧人群;第二,“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表明双方曾经在水网密布河湖地带甚至是水上发生过激烈交战。洱海区域的昆明人等族群以山地游牧为主,不习水战。因此,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应该另外一类人群。结合上文对“土著洱海人”相关问题的分析,该人群可能就是以渔猎、农耕为生计方式的斯榆人(叶榆人)。汉昭帝始元年间的几次武力征伐,虽然兴师动众声势浩大,

但仍未能打通当地族群对该区域的控扼,因此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汉帝国基本放弃了对洱海区域的经营,而是转向了对澜沧江外的永昌地区的开发。

王莽时期(公元9年—22年),为了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强化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此举引发了边疆地区的动乱,也直接影响了西南夷地区的局势。《汉书·王莽传》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三边尽反,遣平蛮将军冯茂将兵击之。”^{[17] (卷92, P4139)}“(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17] (卷92, P4145)}《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亦载:“及王莽政乱,益州郡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嵩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使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徙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不能克而还。”^{[18] (卷86, P2846)}根据方国瑜考证,姑复在今华坪,^{[7] (P89)}栋蚕、若豆、姑复等地区相邻,因此动乱再度波及到洱海区域。王莽对西南夷采取的军事行动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通过武力征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地土著族群的势力。

东汉灭公孙述占据巴蜀后,西南夷土著族群一度归附东汉,但不久就发生了反叛事件。《后汉书·光武纪》记载:“(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秋九月……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二十一年(公元45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18] (卷1, P71-73)}《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记载此事经过说:“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公元43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渡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公元44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公元45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18] (卷86, P2846-2847)}方国瑜认为:“此次战事,栋蚕、姑复、叶榆、弄栋是一个联合地区,所称昆明夷,就是这区域的族名,为此次起义的主力。”^{[11] (P94)}经过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乱,洱海区域各族群受到东汉王朝力量的严重打击,导致区域内部的族群及文化分布格局发生了较大

改变。反映在考古文化上,两汉之际洱海区域土著青铜文化大多迅速转衰,当与该地区长期的战乱有着直接的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洱海区域长期处于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一直未能将其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所以,在史籍记载中,由“昆明”所代表的洱海区域各族群与华夏人群的接触,通常都是以冲突和战争的方式来呈现的。这反映出汉王朝在西南边疆治理过程中,武力威慑和征伐仍然是维系统治的基本手段。如果我们将洱海区域视作一个自成系统的历史空间,在此空间之内,既有长期定居的土著族群,也有不断涌入的外部族群,同时也包括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持续性影响,这使得洱海区域族群关系与分布格局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族群之间的联系更为频繁,原先各不统属、较为分散的部族社会在面对外部力量的压力下,开始走向了联合。土著人群的社会组织力与序阶化程度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增强,社会结构出现了重新整合的趋势。这种社会整合的努力从两汉时期肇始,经历魏晋南北朝的不断孕育过程,终于到唐代,在洱海区域产生了地方性政权——南诏。

四、结语

在汉代文献记载当中,洱海区域的族群和历史,均被刻上了“荒蛮”“化外”“异族”等符号印记。这些记录,旨在体现中原王朝视野下西南地区落后“蛮夷”的形象特征,也反映了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华夏中心观对于边疆社会历史的建构和书写。但是在多维度的历史视角下,洱海区域族群历史的发展变迁则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也蕴含着多面向、多层次的历史脉络。

首先,就洱海区域内部而言,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族群生计方式及文化类型的多元化,而彼此之间相对疏离的生存空间和文化关联,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著人群的政治发育,使土著社会呈现松散、分散的状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而“不同群体对其生存环境的不同‘适应’模式则是不同区域在历史出发点上即形成差异的根本原因”。^{[19] (P95)}

其次,如果将洱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其区域社会和文化皆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与流动性特点。秦汉时期洱海区域概念下的相关叙述,其实就是以区域族群关系和历史结构的某种稳定性为前提和出发点的。正如布罗代尔

的“长时段”理论就是与稳定和缓慢的变迁相联系的。然而洱海区域本身又是特定历史文化变迁的产物,洱海区域社会的形成,除了地理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族群的活动,尤其是以“昆明”等为代表的游牧族群大规模、大范围的迁徙、流动,以及汉王朝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推动和强化了区域内部族群和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可以说,流动性是洱海区域形成和变迁的动力,它在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即流动性视角。

再次,从洱海区域与外部的关系来看,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是这种整合是以土著族群和中央王朝武力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一时期双方之间反复发生的矛盾、冲突和战争,表明中央王朝在进行边疆扩张与治理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阻力。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决定了汉朝很难在此长期立足。“尽管从洱海区域考古发现的东汉墓葬来看,已经有零星汉人移居洱海,仍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说明帝国势力已控制洱海。而在帝国分裂的时期,从公元220年至581年三个多世纪,对洱海区域的控扼与影响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5] (P247)}这充分反映了汉文化与洱海区域社会人群的文化尚未展开全方位接触。直到唐代中期以后,才真正有来自中央王朝的力量深入洱海区域,留下了文化接触和交融的记录,显示出了洱海区域历史的独特发展路径和演变特征。

参考文献:

- [1]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J].考古学报,1977,(2).
- [2] 沈明洁,崔之久,易朝路.洱海环境演变与大理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6).
- [3] 管彦波.民族地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4] 张增祺.洱海区域的古代文明——部落分治时期[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
- [5] 沈海梅.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6]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万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张增祺.彝族的渊源及其形成[A].中国西南民族考古[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 [9] [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 何耀华总主编,李昆声、钱成润主编.云南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11] 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 [12]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 [13] 林超民.秦汉时期西南夷溯源[A].林超民文集第一卷[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 [14] 尹建东.汉唐间南中地域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嬗变——以“夷帅”“长吏”“大姓”为中心的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4).
- [15] 方国瑜.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郡县及经济文化[A].方国瑜文集第一辑[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16] 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
- [17]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8]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9]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侯德彤

Ethnic Groups and Society in Erhai Lake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 Historical Narration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YIN Jian-dong LÜ Xiang-de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rhai Lake area corresponded to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Based on different geograph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they were produ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space and results of constant interac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areas. As an "interventional force", the central dynasty gradually entered the area sinc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permeation of dynastic power promoted further contact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d society in Erhai Lake area.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f geography, transport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non-Huaxia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thnic groups and society in Erhai Lake area and the history of dynasties presented unsynchronized historic evolution features.

Key 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 Erhai Lake area; ethnic group; society